

五四运动前的学生救国会：从“爱国”到“救国”

万 成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1918 年的“五·二一”大请愿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也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这次请愿中成立的学生爱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生爱国会后因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青年学生国家观的转变和关怀政治的现实诉求而改名为学生救国会,并在五四运动的前夕通过开办国民杂志社、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召集北大“五三晚会”等一系列现实活动,为五四示威游行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关键词:五四运动;学生救国会;爱国;救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2-0009-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2.002

The Student Country-Saving Association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Loving the Country” to “Saving the Country”

WAN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May 21st Petition” in 1918 was a prelude and rehearsal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also the first peti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 The Student Patriotic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this petition was to some extent the direct initiator, organizer, and promoter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ue to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change of young students’ national views, and practical demands for political concern, this association was renamed into Student Country-Saving Association, which made sufficient preparations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May Fourth demonst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National Magazine Press, organizing a public education speech group, and convening the “May Third Evening Party” on the eve of the Movement.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udent Country-Saving Association; loving the country; saving the country

五四运动^①因其涉及领域之广、波及范围之大而兼具多种面相,故极具复杂性。虽然已

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众多学者从各种角度阐释、纪念了这场运动,但依然有难以把握之处。彭

作者简介:万成(2000—),男,湖北大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① 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民族主义运动,即从 1919 年 5 月 4 日开始,在中国城市里所展开的一连串爱国主义示威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 1919 年前后几年由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从狭义的五四运动出发进行考察。

明指出:“五四爱国运动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但又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运动。”^{[1]296}他认为它在刚登场时是以有组织、有秩序的一面示人的。毛泽东在回顾五四运动时也强调了其组织性,认为“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并指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2]。这也就是说,如果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看作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那么北京的青年学生则毫无疑问是这场运动的“点火者”。而当前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并未重视“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在学生社团的带领下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这一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学生救国会为中心,探讨该团体从“爱国”到“救国”的转变及其后续运作情况,用以说明学生救国会实际上规定了五四示威游行的秩序,在五四运动的发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缘起:学生爱国会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洲列强深陷战争旋涡无力东顾,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软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侵略者毫无抵抗之力,处处妥协退让。1915年,日本侵略者利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曹汝霖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3]袁世凯因想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不敢与其发生冲突,于是在对“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后便“欣然同意”^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学生和民众民族主义和反军阀意识的觉醒,尤其以反日情绪最为高涨。“二十一条”被公布后,全国各地开始成立各式各样的反日爱国团体,并发起了以“抵制日货”“振兴国货”为口号的抵制日货运动。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通过“西原借款”扶植亲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意欲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企图控制中国

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进而使中国殖民地化。“西原借款”进一步出卖了中国在山东的利益,并埋下了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隐患。留日学生对中日关系一向极为敏感,这些严重威胁国家主权的操作引起了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于1918年5月初得知即将签订协定的消息后,在东京发起了示威游行,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但受到了日本军警的镇压。在李达、李汉俊的领导下,留日学生集体愤然归国,以示抗议。留日学生回到上海后,立即成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并派李达、阮湘等于5月15日前往北京联络。

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代表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校的爱国学生取得联系,得知消息的“北京学界连日极动摇,而全国学术中心之北京大学,忽于20日夜7时在校内开北京大学校救亡会,学生两千余人均到会”^[4]。大会激起了与会学生极大的爱国热情,但“终觉束手无策”。罗家伦在大会上说:“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我们要抱有流血的决心。”^{[5]165}这句话使学生们受到极大鼓舞,决定于次日举行大规模爱国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废除协定。21日,出于安全的考虑,蔡元培曾两次劝导北京大学学生放弃游行,“奈声势涛涛,挽回无法,卒至全体出发矣”^[6]。学生们到达新华门后,冯国璋迫于无奈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协定条约进行了一定解释。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这次请愿潦草收场,各校学生第二天即复课。

“五·二一”大请愿是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的最高潮。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称这是一次类似“公车上书”式的请愿^{[7]44}。虽然这场请愿趋于温和,未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正如上海《民国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其精神上影响于全国民者实将垂之于永久。”^[4]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的第一次请愿活动,

① 原文为:“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见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87页。

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罗家伦评价这场请愿时说:“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却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5]165}在这场请愿中,学生们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后亦吸收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加入。学生爱国会成立后便派代表利用暑假南下活动,先后同上海、天津、南京、济南等地学生取得联系,将组织范围扩展到了全国。不久后,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

二、转变:从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

学生爱国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爱国组织,“爱国”显然是该组织的鲜明底色。“爱国”与“救国”仅一字之差,那么,为何一定要将组织名称改为学生救国会呢?总的来说,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为了顺应“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

(一)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学生爱国会登上历史舞台并改名为学生救国会,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辛亥革命后,“新”与“旧”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出现。既有共和政府的政党政治,又有袁世凯推行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袁世凯死后,“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统一尚未到来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8]。各路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勾结、相互争斗,中国由此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同时,这些军阀为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而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因推翻封建的清王朝而得到改善,反而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李大钊在《隐忧篇》和《大哀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万状”^{[9]3},“满地

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9]12},揭示了社会民生的黑暗,表达了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被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极大振奋了人心,整个中国因此而欢欣鼓舞、普天同庆,好像一战的胜利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带来了“新希望”^[10]。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始庆祝这次难得的胜利。“公理战胜,强权失败”,这简直成了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1]194}。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幻想能实现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便可收回山东,并废除列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乃至实现中国的崛起和世界的永久和平。然而,残酷的事实给了沉浸在幻想中的中国人民当头一棒。前文已提及,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欣然同意”与日本订约,其中就包括了山东的处置问题,给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斡旋带来了极大困难。中国代表团最终无力回天,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在英、美等列强的支持下成了明文规定,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反日外交彻底失败。消息一经传回国内,立即引起了极大震动,国人美梦方觉,终于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7]48}。中国人的乐观与希望在朝夕间破碎。这种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民众对北洋政府的极度失望和长久以来积聚的爱国情绪的集中爆发,也促使他们放弃从前的幻想,开始寻求“救国”的新道路。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正是青年学生群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出的反应。

(二)青年学生国家观的转变

金观涛、刘青峰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1860—1915年“天下”“民族”和“国家”的使用次数进行统计后发现:1905年后,“国家”一词的使用次数大大超过了余下二者^[11]。这说明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的国家观在近代化过程中开始急剧变化而进入形塑期。青年学生国家观的转变就是改名为学生救国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关涉以下两个

问题。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知识界对“国家”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等都对“爱国”“国家”展开过论述。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藏晖室札记》,并从中指出,“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12]。胡适认为应当将狭隘的“爱国”上升到“爱和平”“爱天下”这样的高度,他抨击一战中的西方列强,指出他们的“强权即公理”就是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陈独秀也在1918年严厉指出,“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13]313}。他还进一步提出:“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国家;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13]550}可见,对于“国家”的看法,陈独秀比胡适更为激进,将“国家”当成一种必须彻底破坏的“偶像”,而且把一战爆发的原因也归为“国家”观念作祟,认为“国家主义”“爱国主义”都是浅薄自私和落后的,因而将“爱国”置于鄙夷的地位。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们主办的《新青年》在当时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国民杂志社在邀请罗家伦加入时,罗家伦也表示“对于这种比较狭义国家观的刊物不很热心”^{[5]165}。“国家观”成为彼时颇具争议的问题,“爱国”这样的观念便逐渐开始遭到一部分青年学生的唾弃和批判。

二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的流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区声白等都是忠实的无政府主义信徒。他们反对一切强权,把“国家”看作万恶之首,认为“国家”导致了冲突和不平等,主张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的互助。恽代英早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时就宣称“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14]256}。许德珩

作为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学生爱国会筹办者之一,在回忆学生爱国会时直接谈到了这点,指出:有些人受了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为适应环境,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15]。无政府主义对封建强权的猛烈攻击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正迎合了广大青年学生对现实政治的失望悲观情绪。因此,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不少学校的青年学生都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难免对“国家”与“爱国”等观念产生负面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并非彻底抛弃了国家,恽代英就曾在《力行救国论》中指出:“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14]69}可见他们也主张“须救国、应救国”,要求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社会革命。因此,为了积极与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相适应,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随后学生救国会立即引导青年学生采取积极的救国行动,以此促进青年学生救国意识的觉醒,并争取吸引、团结更多青年学生加入。

(三)青年学生关怀政治的现实诉求

从“爱国”到“救国”,除了源于观念上的转变之外,还是现实政治的产物。出于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担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停留在思想情感上的“爱国”,而是开始要求“直接行动”。“五·二一”大请愿虽然发动了两千多名爱国学生参加,但这是一场“十分温和”的请愿,学生们“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整个活动未取得实际结果而被劝回,颇有些“虎头蛇尾”之意^{[7]44}。但学生们在这场请愿中也吸取了教训,为发起更激烈之五四运动积累了直接经验。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名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将上海和巴黎的和会称为“两个分赃会议”,表达了其对国内军阀和西方列强的极度不满,认为这些所谓的“和会”并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呼吁“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13]461}。恽代英也反对空谈爱国,主张“力行救国”,他指出:“说而不能行,行之而

不切实,不勇猛,故是数说者,徒为口说争辩之资料而已;吾等望以口说争辩救国家,此岂非说饼而欲求饱腹乎。”^{[14]69}陈独秀和恽代英虽然都要求积极救国,并将救国付诸行动,但他们却未指出具体的救国方式。李大钊在劝告国人“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16]250}后,号召国人积极投身运动,为救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即“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16]219-220},才能救国于将亡。可见“救国”是将单纯思想观念上的“爱国”付诸实践,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列强压迫侵略中国的直接回应。此后,无数中国仁人志士开始苦苦思索救国之路。

北京大学学生率先开始探索救国的实际方法,他们提出了三种大致的救国方法,即:支持爱国者进入国会,改良政治;加强新文化运动,将新文化运动当成救国的正当途径;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统治^{[7]45}。虽然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些方法行不通,但他们至少开始着眼于救国的现实需要,主张以实际行动救国,并最后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救国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7]45}。于是他们态度鲜明地将“救国”直接付诸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学生救国会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一转变的影响,其改名正好从侧面展现了这一时期青年学生对政治的现实关怀。受此影响,无数青年学生开始关注国家大事,担忧国家的前途命运,纷纷走出书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的实际斗争中,成为五四运动的预备军和主力军。

三、运作:学生救国会的角色发挥及实际工作

学生救国会中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对寄希望于统治者“救亡图存”的幻想业已破灭,于是将爱国、救国的现实路径诉诸普通大众,希望得

到大众的支持。五四运动前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宣传、组织工作而展开,为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行动做了准备。学生救国会通过开办杂志社、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宣传反日爱国思想,并最终在北大“五三晚会”上决定组织发起五四爱国游行。五四游行示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一)宣传:开办国民杂志社,发行《国民》杂志

学生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引起了军阀的不安与恐惧,北洋政府训令北京大学:“此种行动实属轶出教育范围,各该校主管职员对于校内生徒等务各严切告诫。”^[17]但学生救国会并未因此屈服,反而更进一步开展工作。学生救国会的学生们普遍认为:“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7]45}为了将反日爱国的宣传推向深入、加强与各地联系、实现救国目标,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国民杂志社,筹备出版《国民》杂志。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徐宝轩、邵飘萍、徐彬彬等出席了成立大会,蔡元培在会上致辞:“诸君为此,志在拯国家于危亡,深堪嘉尚……鄙人与诸君同一愉快。”^{[18]49-50}会上还选出邓康(中夏)、许德珩、黄日葵、高尚德(君宇)等组成编辑委员会。杂志社除邀请李大钊作指导外,还约请了邵飘萍和徐悲鸿作顾问^{[18]51}。邵飘萍十分支持国民杂志社的成立,并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如为鄙人所能及者,当竭力相助。”^①国民杂志社秉持了学生救国会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吸引了一大批欲“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罗家伦回忆说:“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5]166}可见国民杂志社的实践倾向。张国焘也回忆道:“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7]46}但由于国民杂志

①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第89页。

社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以“爱国”“救国”吸引青年加入,因此也就难免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少数保守派,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提倡一致救国;三是与调和派势均力敌的急进派,主张革命救国^{[7]46}。这也是五四运动前夕各爱国社团存在的普遍现象。

《国民》杂志原打算在杂志社成立之前出刊,但由于内部人员挪用公款而不得不推迟。邓中夏接手经费管理后多方筹集资金,《国民》杂志才于 19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创刊。1918 年 12 月 9 日,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国民杂志社启事》,明确提出了《国民》的宗旨:“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下列四大宗旨:第一,增进国民人格;第二灌输国民常识;第三,提倡国货;第四,研究学术。”^[19]邵飘萍对此宗旨大加赞赏,表示“贵社创刊杂志所注意之四大端”,“正和鄙怀,至深钦仰”,“需助之处,惟力是视”^①。

《国民》的反帝爱国色彩极为鲜明。邓中夏用“大壑”这一笔名在《国民》上发表了多篇国内外时事评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19 年 2 月 1 日,作为国民杂志社指导的李大钊于《国民》第 1 卷第 2 号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文章向日本帝国主义所宣称的“大亚细亚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20]。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增强了青年参加反日斗争的信心与决心,有力地支持了国民杂志社的反日爱国立场。同年 11 月 1 日,李大钊又在《国民》第 2 卷第 1 号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进一步阐明了其“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帮助一部分青年扫清了反日爱国斗争中的一些错误观念,还有力宣传了《国民》杂志的“救国”立场,也使得社会大众加

深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进而投身于反日爱国的现实斗争中。

《国民》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主要以政论为主,以“救国”为根本目的,极为重视国民性问题,带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同时,该刊物主要受众是知识分子群体,对促进其思想启蒙与社会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也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 动员: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进行街头讲演

五四运动前夕,学生救国会拟在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起人有邓康、廖书仓、康白情、易克嶷、陈宝锬、黄日葵、许德珩、罗家伦等 12 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救国会的成员。“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21],它的成立也是学生救国会“救国”的一个重要实践活动。3 月 7 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及简章。该启事宣布“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演讲为方法”,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22]。22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登载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公布了新的团员名单,共计 39 人。23 日,平民教育讲演团于马神庙理科校长室正式成立。

讲演团成立后,团员们走上街头开始讲演。“4 月 3 日至 5 日每日下午 1—5 时,团员们都去东便门内蟠桃宫进行讲演。”^{[23]212}讲演的主题多以“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为主^{[7]47},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当时蟠桃宫正在举办庙会,且“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24]。平民教育讲演团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当时正处于五四运动前夕,国内暗流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讲演团的活动受到了北洋政府的严格管控,以各种条件对其加

①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1985 年第 89 页。

以限制。但4月27日,讲演团冲破了北洋政府的高压控制,在护国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讲演。

正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中所述:“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22]大部分普通民众因为文化程度低,无法从纸质印刷品中接收信息,因此只有通过面对面讲演的形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动员普通民众,这与学生救国会创办发行《国民》杂志向知识分子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是相呼应的。讲演团的活动使得学生通过讲演的方式深入社会实际,成为学生联系群众的纽带,由此将“爱国”与“救国”思想输送给民众。这种利用讲演作为鼓动民众的方式后被学生运动广泛采用^[23]^[215]。这些讲演活动实现了学生与民众的初步结合,唤醒了民众并使其投入爱国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和群众准备。

(三)发起:召集北大“五三晚会”,掀起五四示威游行

巴黎和会期间,国内民众一直密切关注着和会的动向,当得知中国在和会上毫无话语权甚至可能一无所获时,全都陷入了极大的悲愤中。国内各团体积极联合起来表示愿意支持政府和代表团,希望政府和代表团能够坚持到底。然而,噩耗最终还是来临。5月1日,上海《大陆报》之北京通讯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25]这一消息深深刺痛了中国人民的神经,长久以来积压的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5月2日,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循例在北京大学西斋大饭厅举行社务会议,讨论杂志出版编辑问题,原本只有十多名社员参加,但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和北洋政府的妥协,同学们群情激愤,参加会议的人数大大增加,会议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随后,学生们决定由国民杂志社发起,在五天后“国耻纪念日”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且表示这次游行“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到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18]^[57]。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国民杂志

社通告北京大学及其他各校代表,于次日晚7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学生救国会还联系了女校学生一同参加大会。

5月3日,邵飘萍来到北京大学作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及原因的报告,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及当时的形势。北京大学的一批在校学生听罢即于第三院礼堂召集临时会议,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罪行,要求严惩国贼。学生们情绪高昂,难以抑制,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等因而改变了在5月7日进行游行示威的决定,当场决定于第二天发动,并推出20名委员联络各校。大会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集齐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18]^[59]次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示威游行就此开始。

可以看到,原本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社只是在5月2日循例召开社务会议,并未涉及后续的游行。但因学生们高涨的爱国情绪,会议才商定在五天后组织开展一次示威大游行。而5月3日晚的临时会议也正是在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下,决定顺应学生们的反帝爱国情绪,将原本定于5月7日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第二天。这说明,学生救国会对五四示威游行的发动起到了重要的直接推动作用。

四、结语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学生救国会的领导者之一许德珩曾表示: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参与者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整个运动也绝非“无组织”“混乱不堪”且“软弱无力”,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的普遍运动^[21]。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来华讲学,他在6月20日写给女儿的信中表示:认为学生们的游行是“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的看法是不公平的,指出“整个示威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而且实际发动时间比原计划要早”,并表示“这真是一

个了不起的国家”^[26]。学生救国会的救国实践对五四运动的发起起到了动员、组织和推动作用: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的成立使得北京学生的五四示威游行一经爆发,就能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响应,并迅速发展成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国民》杂志的出版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社会活动,在社会大众中有力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动员了中国民众采取直接的反帝爱国行动;国民杂志社召集的北大“五三晚会”更是直接促成了五四示威游行的发起,进而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

参考文献:

- [1] 彭明. 五四运动史[M]. 修订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3-404.
- [3] 李新,李宗一. 中华民国史:第2卷(1912—1916)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1:504.
- [4] 北京学界空前之爱国举动[N]. 民国日报,1918-05-24(1).
- [5] 罗家伦. 罗家伦文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6] 本校全体学生往府请愿[N]. 北京大学日刊,1918-05-22(1).
- [7] 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 [8]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33.
- [9]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罗志田. “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J]. 历史研究,2006(4):105-124.
- [11] 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2.
- [12] 胡适. 藏晖室札记(续)[J]. 新青年,1917(3):38.
- [13]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4] 恽代英. 恽代英文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运动回忆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31.
- [1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7] 教育部训令第二七九号[N]. 北京大学日刊,1918-07-23(1).
- [18] 许德珩. 为了民主与科学[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 [19] 国民杂志社启事[N]. 北京大学日刊,1918-12-19(1).
- [20]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6.
- [21] 许德珩. 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2):20.
- [22] 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N]. 北京大学日刊,1919-03-07(1).
- [23] 张惠芝. 五四运动前的学生运动[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 [24] 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N]. 北京大学日刊,1919-04-11(1).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五四爱国运动: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77.
- [26] 约翰·杜威. 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M]. 刘幸,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32.

(责任编辑:冯兆娜)